

## 1970-1980 年代黨外的歷史建構

蕭阿勤\*

從 1947 年「二二八事件」結束到 1960 年代，海外反中國國民黨的臺灣人已經建構他們自己的臺灣歷史敘事，以闡述其政治主張。其中最著名的是蘇新的《憤怒的臺灣》、史明的《臺灣人四百年史》、以及王育德的《臺灣：苦悶的歷史》。<sup>1</sup> 雖然三人的政治理念不同，但都強調從臺灣人被統治與被壓迫的立場闡述臺灣史，以取代統治者和壓迫者（包括來自西方、中國與日本的殖民政權，以及國民黨政府）的觀點。不過在八〇年代末之前，他們的著作在臺灣都被國民黨政府列為禁書，只能私下閱讀，因此對於七〇、八〇年代黨外政治反對運動的歷史重構，其影響有限。尤其是八〇年代「臺灣史觀」的浮現，主要起因於國內重大政治變化，特別是高雄「美麗島事件」，而非來自海外臺灣人政治異議者的歷史論著。<sup>2</sup>

然而八〇年代黨外的歷史建構，包括廣泛的臺灣史觀發展，又奠基於七〇年代的政治、文化變遷。1970 年代的臺灣，在政治上開始「回歸現實」，在文化上「回歸鄉土」。當時挑戰既有體制的主力，是在戰後成長而包括本、外省籍的年輕知識份子。他們深受七〇年代初臺灣外交挫敗的刺激而覺醒，批判國民黨統治所形塑的「流亡」心態，以及相關的政治體制與文化生產，

---

\* 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專任研究員

<sup>1</sup> 蘇新，《憤怒的臺灣》（臺北：時報文化，1993 年）；史明，《臺灣人四百年史》（聖荷西，美國加州：蓬島文化公司，1962 年）；王育德，《臺灣：苦悶的歷史》（臺北：自立晚報，1964 年）。

<sup>2</sup> 見張炎憲，〈臺灣史研究的新精神〉，《臺灣史料研究》，第 1 期（1993 年），頁 84。

因此形成我所謂的「回歸現實世代」。他們涵蓋當時挑戰國民黨統治的「黨外」人士在內，基本上仍在中國民族主義的視野下發現鄉土、理解臺灣及其歷史，也傾向於體制內的革新與民主。他們追求的，可以說是「去流亡」的政治與文化。1979 年底的美麗島事件嚴重打擊黨外，也使邁入八〇年代

3

## 1970 年代：挖掘鄉土歷史

戰後臺灣重大的政治、文化變遷，始於 1970 年代。六〇、七〇年代之交，經濟起飛後的臺灣面臨農村凋蔽、勞資糾紛、貧富不均等問題。七〇年代初釣魚台列嶼主權爭議、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正常化」、中華民國被逐出聯合國、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等嚴重的外交挫敗，更強烈打擊國民黨政府。這些國內外變化，迫使國民黨採取所謂「革新保台」政策，而此時也正值由蔣中正到蔣經國的權力交替階段。

從釣魚台事件引發的「保衛釣魚台運動」（保釣）開始，以國立臺灣大學（臺大）學生為主的青年學生已逐漸關切政治社會改革。另外，《大學雜誌》在 1970 年底改組，容納 60 幾位學術、政治、企業界具有社會政治改革意識的年輕一代為社務委員。在保釣運動後臺灣遭受一連串外交挫折，人心危疑不安的兩年左右，年輕一代本省籍的民意代表黃信介與康寧祥所領導的黨外運動尚處於起始階段。此時臺灣要求社會政治改革的動力，主要來自臺大校園與《大學雜誌》，而兩者互相呼應。

---

<sup>3</sup> 本文以下乃根據筆者下列著作所改寫：蕭阿勤，《回歸現實：臺灣一九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0 年第 2 版）；蕭阿勤，《重構臺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臺北：聯經，2012 年）；A-chin Hsiau, *Contemporary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 (London: Routledge, 2000)；A-chin Hsiau, *Politics and Cultural Nativism in 1970s Taiwan: Youth, Narrative, Nation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1)。

至 1972 年底，由於國民黨逐漸無法容忍，《大學雜誌》已倍感壓力。保釣運動後兩年左右戰後世代的革新言論，包括激烈的「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呼聲，已趨於沈寂。1973 年春，臺大哲學系開始受到人事「整頓」，發生「臺大哲學系事件」，至此國民黨已具體壓制保釣以來臺大師生的政治社會革新言論與活動。但許多覺醒的大學生與年輕知識份子早已尋求更直接推動社會政治改革的方式，投入黨外運動，成為「黨外新生代」。

這期間，文化界開始批判現代主義文學、挖掘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提倡具有社會批判意識的鄉土小說。<sup>4</sup> 黨外的康寧祥與新生代，則致力於發揚 1920 年代日據時期臺灣人政治社會運動史。當時又出現提倡「中國現代舞」的「雲門舞集」、「中國現代民歌運動」、推崇洪通的繪畫及朱銘的雕刻等。這些都共同促成回歸鄉土的文化潮流，而推動這個潮流的文化、政治菁英，正是回歸現實世代的重要份子。他們包括本、外省籍，大約在 20 到 40 幾歲之間。由於接受國民黨統治下的學校教育與社會教化，他們普遍都懷抱中國國族認同，而在理解做為「鄉土」的臺灣的歷史文化，或是理解個人及世代的社會角色時，都高度依賴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

七〇年代的黨外人士普遍有強烈的歷史意識或歷史感，對自己的世代身分有清楚自覺，也關懷臺灣歷史，尤其是日據時期臺灣人反抗殖民統治的政治社會運動史。這兩方面的特殊歷史感，首先展現在康寧祥身上。1972 年 6 月，蔣經國就任行政院長，開啟國民黨由蔣中正到蔣經國的權力交替。同年底，康寧祥的台北市議員任期尚未結束，即投入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在台北市以次高票當選為立法委員。1975 年 3 月，他針對蔣經國的「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質詢，指出中華民國的國際承認減少已威脅「法統」，而少數老人卻壟斷政治領導階層。他呼籲國民黨當局重視高居全人口 87.8%、戰後成長的 49 歲以下的世代對中華民國前途的主張和需求。他提出四大政治變革主張，除了要求調整國家預算以因應臺灣社會實際需要、制訂「政黨法」以促成在野黨成立、地方政制法治化之外，並要求國民黨

---

<sup>4</sup> 「日據時期」是 1970 年代臺灣社會提及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普遍用詞，來自當時佔優勢的中國史觀與國族認同。本文依此用法，以反映其時代氛圍。

當局應該「重新確認臺灣『歷史文化』的價值和地位」。他特別強調後來受威爾遜總統的民族自決主張、中國五四運動等影響，而以蔡惠如、林獻堂等人為先導的抗日政治鬥爭運動，並簡述「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臺灣文化協會」、「臺灣民眾黨」與「臺灣地方自治聯盟」的歷史。康寧祥指出，「臺灣人受日人欺辱、壓迫、殺害而受的痛苦和犧牲，並不下於大陸同胞八年抗戰之苦」，「日本統治下的臺灣民眾懷有堅強的民族意識」，始終抗日而「思慕祖國」。他認為這段史事是「中華民國歷史文化的珍貴財富」，應該編入歷史教科書，以使青年學子了解祖先。<sup>5</sup>

事實上，與《大學雜誌》社長陳少廷於 1971 年 7 月在該刊發表的〈林獻堂先生與「祖國事件」——兼論臺灣智識分子抗日運動的歷史意義〉、1972 年 5 月發表的〈五四與臺灣新文學運動〉，以及與 1973 年底之後文化界年輕世代熱烈探索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相比，康寧祥在 1975 年的質詢中公開強調日據時期臺灣人政治社會運動史，是較為晚出的。<sup>6</sup>不過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康寧祥的質詢有其特殊重要之處：這應該是臺灣戰後第一次由政治異議人士在中央民意代表機構正式向國民黨最高權力當局論及具有政治敏感性的日據時代政治社會運動史。但是康寧祥的陳述運用中國民族主義歷史敘事以建構在臺灣的「中國人抗日史」、強調臺灣先民與歷史的「中國性」，反映了他在政治上的體制內改良主義，因而減弱了他的呼籲對國民黨意識形態的挑戰。當時國民黨政府面臨嚴重外交挫折，加上海外臺灣獨立運動顯著發展，都威脅到國民黨的統治正當性。因此康寧祥強調臺灣人及其歷史文化的中國性，未必不受國民黨政府歡迎。事實上，蔣經國在答詢時隨即贊同將臺灣人反清、抗日史編入教科書，以使臺澎同胞了解他們當今更要同心協力完成「反共復國」的任務。<sup>7</sup>

康寧祥在步入政壇之前，就已認識王詩琅、郭國基等曾親歷日據時期

<sup>5</sup> 《立法院公報》，第 64 卷第 19 期（1975 年 3 月 5 日），頁 8-14。

<sup>6</sup> 陳少廷，〈林獻堂先生與「祖國事件」——兼論臺灣智識分子抗日運動的歷史意義〉，《大學雜誌》，第 43 期（1971 年），頁 4-8；陳少廷，〈五四與臺灣新文學運動〉，《大學雜誌》，第 53 期（1972 年），頁 18-24。

<sup>7</sup> 《立法院公報》，第 64 卷第 19 期（1975 年 3 月 5 日），頁 19。

的政治、文化菁英，得以聽聞他們的經驗，並閱讀坊間所少見關於日據時期的文獻。因此相較於一般戰後世代成員，康寧祥更熟悉日據時期歷史。他後來在為黃信介助選或自己的政見發表會中，經常引用這段歷史，包括闡述蔣渭水以身為臺灣人為榮的精神及改革日據下臺灣社會的主張。康寧祥的言行，象徵日據時期臺灣人政治社會運動與七〇年代黨外政治反對運動的一絲微弱連繫。當時張俊宏曾將抗日人士稱為「臺灣近代第一代先覺者」，肯定康寧祥在選舉中講述這段「歷史遺產」，無疑「給迷茫而缺乏自信的民眾一種嚴肅的歷史使命感」，「使大眾發現了自我，發覺了自尊」。<sup>8</sup>

上述微弱的連繫，後來也表現在黃信介、康寧祥與張俊宏等人在 1975 年 8 月創刊的《臺灣政論》上。這份七〇年代第一份黨外雜誌，發行五期後被禁。其中四期都各有一篇文章介紹 1920 年代臺灣人抗日政治社會運動或人物，亦即曾經追隨林獻堂的葉榮鐘（以「凡夫」為筆名）所撰的〈臺灣民族運動的鋪路人蔡惠如〉、〈臺灣民族詩人林幼春〉、〈革命家蔣渭水〉，以及以正宏為筆名的王詩琅譯自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的〈日本人眼中的臺灣抗日運動〉。<sup>9</sup> 葉榮鐘的文章既推崇抗日運動中的祖國派，但又批評其不重視臺灣現實，這種立場大致與《臺灣政論》在政治上的溫和改良主義相近。僅比康寧祥年輕一歲、早在六〇年代就從事政治反對活動的黃華，被以「叛亂罪」入獄八年、因蔣中正去世而減刑出獄，1975 年秋在《臺灣政論》陸續發表文章。他表示不改其志而仍將投身於政治運動時，也談到「日據時代，臺灣的民族英雄如蔣渭水、郭國基等等不都是為著爭取臺灣的自由平等而關過」，但仍繼續從事政治活動。<sup>10</sup>

繼康寧祥、《臺灣政論》之後，黨外持續宣揚臺灣史（尤其是日據時期

---

<sup>8</sup> 〈紀念革命先賢蔣渭水先生逝世 46 週年座談會〉，《這一代雜誌》，第 2 期（1977 年 8 月），頁 62。

<sup>9</sup> 葉榮鐘，〈臺灣民族運動的鋪路人蔡惠如〉，《臺灣政論》，第 1 期（1975 年），頁 56-58；凡夫（葉榮鐘），〈臺灣民族詩人林幼春〉，《臺灣政論》，第 3 期（1975 年），頁 66-69；〈革命家蔣渭水〉，《臺灣政論》，第 5 期（1975 年），頁 76-79；正宏，〈日本人眼中的臺灣抗日運動〉，《臺灣政論》，第 4 期（1975 年），48-52。

<sup>10</sup> 黃華，〈減刑人的信心〉，《臺灣政論》，第 3 期（1975 年），頁 40。

臺灣人政治社會運動史)，成為七〇年代回歸鄉土文化潮流的一部份。這主要由於當時（尤其 1975 至 1978 年間）許多回歸現實的年輕知識分子相繼投入黨外運動，並經常講論這段歷史，以尋求他們當代行動的歷史聯繫與定位。

黨外人士對臺灣歷史的關懷，主要針對日據時期，特別是臺灣人反抗殖民統治的政治社會運動史。這反映在美麗島事件之前的七〇年代最主要的四份黨外雜誌，亦即《臺灣政論》、《這一代雜誌》、《八十年代》、《美麗島》。除了最早的《臺灣政論》觸及臺灣歷史的四篇文章都是關於抗日政治社會運動與人物之外，《這一代雜誌》、《八十年代》、《美麗島》涉及非日據時期的臺灣史文章各有三、五、三篇，而單獨涉及日據時期歷史的文章卻各有九、六、四篇（包括系列報導、座談會記錄、史料重刊等），其中除了少數三、四篇之外，都在探索二〇年代臺灣人對殖民統治的反抗。

從《這一代雜誌》、《八十年代》、《美麗島》有關日據時期的文章可以看出，黃煌雄在黨外對臺灣人抗日政治社會運動史的宣揚中扮演重要角色。當時三十歲出頭的黃煌雄，在 1978 年底首次成為黨外立委候選人時，已被稱為「研究臺灣史的專家」。<sup>11</sup> 此前黃煌雄於《臺灣新生報》與《中國時報》海外版上，已發表不少探討日據時期歷史的文章。他撰述的重點在二〇年代臺灣人的抗日，並且出版了三本書：《臺灣的先知先覺者——蔣渭水先生》、《台胞抗日史話》、《被壓迫者的怒吼——蔣渭水先生選集》。<sup>12</sup> 除了康寧祥之外，他大概是當時最熟悉二〇年代臺灣人反抗殖民統治歷史的黨外人士。但康寧祥並無相關著作，因此黃煌雄在這方面的用心與用功，在黨外人士中無人能及。他致力於將臺灣人的抗日活動與戰後世代投身的反國民黨政治運動聯繫起來，為自己所屬的世代與黨外運動在臺灣歷史上，也在中國歷史上，尋找定位與意義。黃煌雄充分代表 1975-1978 年間投入黨外、充滿強烈歷史感，並且以基於中國（民族）認同的歷史敘事來理解自我、世

<sup>11</sup> 林正杰，〈我的政治見解：黃煌雄訪問記〉，《這一代雜誌》，第 15 期（1978 年），頁 53。

<sup>12</sup> 黃煌雄，《臺灣的先知先覺者——蔣渭水先生》（臺北：作者自印，1976 年）；黃煌雄，《台胞抗日史話》（臺北：作者自印，1977 年）；黃煌雄編，《被壓迫者的怒吼——蔣渭水先生選集》（臺北：長橋，1978 年）。

代、行動的回歸現實世代知識分子。

黃煌雄在加入黨外之前已致力於探討他所謂「臺灣近代民族運動」(亦即日據後期非武裝抗日運動)中的「先覺者」。在回歸鄉土潮流中,他強調先覺者充滿「對鄉土的感情以及為同胞求幸福的願望」,而日據後期非武裝抗日運動是「知識分子在臺灣歷史上第一次表現出群體狂熱的愛鄉運動」。<sup>13</sup> 在為戰後世代與黨外運動尋找歷史定位與意義時,他將七〇年代投入黨外的年輕知識分子,比擬於半世紀前反抗日人統治的臺灣知識青年。<sup>14</sup> 他認為戰後世代今後在面對歷史的挑戰下,還應從這些被遺忘的先覺者奮鬥史的精神遺產中得到能源和動力。<sup>15</sup>

黃煌雄的《台胞抗日史話》將先覺者(尤其是1927年臺灣文化協會正式分裂之前)的精神遺產歸納為六點:(1)他們受世界局勢、思潮與被殖民下不平等所激發的「自覺意識」;(2)致力於社會教育的「啟蒙精神」;(3)無私奉獻而「純樸的動機」;(4)勇敢實踐而達成「政治經驗的累積」;(5)對殖民統治的反抗,「打破隸屬觀念」而「激發臺灣同胞的漢民族意識」,「並使臺灣同胞以中華民族為榮」;(6)具有強烈的「民族情操」,「對中華民族具有濃厚的認同感,並對中華民族寄予高度的期望」,同時相當尊崇代表中國近代革命主流的孫中山。黃煌雄強調先覺者與臺灣同胞「絕對沒有對不起祖國」,「更絕對沒有對不起中華民族」。<sup>16</sup> 這種強調,相當類似前述康寧祥對蔣經國的質詢,亦即希望臺灣歷史經驗的特殊性與「中國性」被尊重與承認,以使本省人在國民黨統治下有政治上與文化上的平等地位。

黃煌雄強調日據後期抗日的臺灣人認同中國、中華民族,而他對於這段歷史的研究,就集中在被日本殖民當局視為「極端民族自決主義者」的

---

<sup>13</sup> 黃煌雄,《台胞抗日史話》,頁189;黃煌雄,《國民黨往何處去?》(臺北:長橋,1978年),頁186;黃煌雄,〈從蔣渭水精神談起:兼論臺灣的昨天今天與明天——民國六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在「蔣渭水紀念歌發表會」上專題演講詞〉,《這一代雜誌》,第16期(1978年),頁44-45。

<sup>14</sup> 黃煌雄,《國民黨往何處去?》,頁13、15。

<sup>15</sup> 〈臺灣近代「先覺者」的精神遺產座談會〉,《這一代雜誌》,第3期(1977年9月),頁18。

<sup>16</sup> 黃煌雄,《台胞抗日史話》,頁184-202。

蔣渭水。他認為「蔣渭水先生的精神和命運，幾乎說明了臺灣近代民族運動的全部涵義」。<sup>17</sup> 他於 1976 年秋出版《臺灣的先知先覺者——蔣渭水先生》，並自認為「可能是目前臺灣及世界上第一本以蔣渭水先生為主題而寫的書」。<sup>18</sup> 黃煌雄指出蔣渭水的認同與主張深受孫中山影響，認為他是「臺灣同胞非武裝抗日運動最具影響力」、「日據時代臺灣同胞之中最強烈的民族主義者」，是「臺灣的孫中山」。<sup>19</sup> 他呼籲孫中山領導的中國近代革命運動與蔣渭水代表的臺灣近代民族運動應結合，期望承繼前者的國民黨與接續後者的黨外都超越黨派與省籍之爭，共同追求民主，建立「中華民族五千年未曾真正出現過的民主體制」。<sup>20</sup>

雖然七〇年代黨外以中國民族主義敘事來理解政治反對運動，但面對外交孤立與中共威脅，其實際行動則以保衛臺灣為目的。一般而言，黨外人士即使懷抱中國（民族）認同，但在政治上落實的國家選擇，至多是沒有排除一個可能涵蓋臺灣與大陸的「未來中國」。黨外人士致力的是如何確保「臺灣中國」，以對抗「大陸中國」。<sup>21</sup> 這正代表當時覺醒的戰後世代知識分子普遍揚棄流亡漂泊心態、回歸現實，強調革新自強、建國優先、民主至上的理念。

1979 年元旦美國與臺灣斷交後到年底美麗島事件發生前，呂秀蓮公開提出的「中華民國獨立」主張，充分展現上述黨外的理念。1971 年夏，呂秀蓮在美國獲得比較法學碩士後回臺灣，積極提倡「新女性主義」。1978 年夏，她再度赴美，接觸到大量關於臺灣而過去未見的史籍，體認到自己與其他人都了解臺灣歷史，於是開始整理資料與寫作。她重新認識臺灣的過去，使她「深覺婦女的本質問題與臺灣人的歷史命運有許多若合符節的

---

<sup>17</sup> 黃煌雄，〈一項莊嚴的建議——紀念蔣渭水先生逝世四十七週年〉，《這一代雜誌》，第 12 期（1978 年），頁 21。

<sup>18</sup> 黃煌雄，《革命家——蔣渭水》（臺北：長橋，1978 年），頁 25。

<sup>19</sup> 黃煌雄，《革命家——蔣渭水》，頁 23、238、261-282。

<sup>20</sup> 黃煌雄，《國民黨往何處去？》，頁 8-9、22；黃煌雄，〈競爭者之路——國民黨與黨外的健全化〉，《八十年代》，第 1 卷第 1 期（1979 年），頁 8。

<sup>21</sup> 例如張景涵，〈我們的方向與現代化〉，《臺灣政論》，第 4 期（1975 年），頁 9-15。



地方」。<sup>22</sup> 1978 年底，她成為桃園縣增額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的黨外候選人，在競選期間出版《臺灣的過去與未來》一書，並於美國對臺灣斷交、選舉停辦後的隔年再度修訂出版。與黃煌雄的著作類似，這本書體現了七〇年代黨外特殊的歷史觀，但兩者相比，呂秀蓮要比黃煌雄更有系統地呈現，也更大膽挑戰國民黨的意識形態。

呂秀蓮在書中強調她要「大膽地超越傳統中國本位主義的立場，只單純地站在臺灣本土以及居住在臺灣本土的人民的立場」。她認為，臺灣的過去是一部充滿移民與殖民過程的開發史：移民者在臺灣尋找安身立命之地，能「與臺灣認同，老死臺灣」。殖民者則搜刮剝削，壓榨人民，「既不認同臺灣，臨危則三十六計逃為上策」。她指出西班牙、荷蘭、明鄭、清廷與日本的「外來政權」，以「少數人統治多數人」，都是與人民之間彼此沒有認同、利害相反的殖民者。因此她強調：「臺灣歷史的基本特色是，它是一段三百年來沒有主權，身不由己，任人擺佈的悲慘歷史！」。呂秀蓮認為臺灣在國際上孤立、前途堪慮，人民應「當家做主」，擺脫如同孤兒、養女的歷史悲運，爭取對土地與政府的主權，自立自救。她強調臺灣住民無所謂本省外省之分，差別只在移民先後，「凡是認同臺灣，願意與臺灣共存亡而同甘共苦的都是臺灣人」。雖然呂秀蓮表示「臺灣是中國的一省」、「愛臺灣即是愛中國」、「臺灣人是中華民族」，但她在政治上的現實主張是未來的「一個中國——但不是現在」。她呼籲國民黨放棄中國只有一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中華民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堅持，主張「……破釜沈舟地宣佈臺灣脫離中國大陸，中華民國獨立自主，將為我們必須面臨的抉擇。此一抉擇可以直接宣布臺灣獨立的表面化方式公然行之，也可以兩個中國，一個中國兩個政府的實質方式替代……」。<sup>23</sup>

在美麗島事件發生的三個月前修訂出版的《臺灣的過去與未來》，是七〇年代黨外歷史敘事的重要尾聲，也是八〇年代黨外「臺灣意識」、臺灣史觀、獨立建國主張的先聲。激化黨外及其支持者的政治理念與行動的，是

<sup>22</sup> 呂秀蓮，《臺灣的過去與未來》（臺北：拓荒者，1979 年），頁 63。

<sup>23</sup> 呂秀蓮，《臺灣的過去與未來》，頁 58-61、105-108、161, 241。

七〇、八〇年代之交，國民黨政府面對黨外挑戰時所主導的壓制、衝突、暴力、流血、構陷、監禁、謀殺與眾多的犧牲。七〇年代的回歸現實世代所提倡的鄉土文學、挖掘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以及黨外的臺灣歷史探索，正提供了八〇年代臺灣民族主義歷史敘事所需的素材。

## 1980 年代：書寫民族歷史

美麗島事件導致八〇年代上半葉政治反對運動激進化，黨外人士此時提倡的臺灣意識，主要以重新詮釋臺灣史為基礎。他們試圖重塑臺灣民眾的集體記憶，爭取他們的支持。臺灣史觀事實上是由黨外人士所引領倡導的。他們既抨擊國民黨政府的「中國意識」，也批判以左派自居的異議人士的中國意識，尤其是圍繞在《夏潮論壇》雜誌而以陳映真為代表者。儘管陳映真等人批評國民黨政府的資本主義經濟政策，指責它過度依賴「帝國主義勢力」（尤其是美國），但對黨外人士來說，這些左派人士與國民黨同樣堅持中國民族主義、追求中國統一，所以沒有太大差別。1983 年的「臺灣意識論戰」，主要發生於《夏潮論壇》作者群和屬於黨外激進派的《生根週刊》作者群之間，雙方都經常譏諷對方對臺灣史的「無知」或「扭曲」，宣稱自己的理解更為全面、客觀與正確。<sup>24</sup> 一般而言，國民黨政府與左派異議人士都強調臺灣和中國大陸並無太大不同，歷史文化有密切關係，而黨外人士則突顯臺灣的獨特性以及特殊的歷史發展道路。黨外政論雜誌，經常刊登關於 1945 年之前臺灣歷史的文章。例如《生根週刊》即是如此，而這份刊物也登載一系列「大家來學臺灣話」的文章，教導讀者認識台語。又如黨外溫和派領袖康寧祥主持的《八十年代》雜誌，也在 1983 年之後陸續刊出一系列的文章介紹臺灣史。在這段期間，臺灣史與黨外運動的關連

<sup>24</sup> 例如宋冬陽，〈現階段臺灣文學本土化的問題〉，《臺灣文藝》，第 86 期（1984 年），頁 10-40；戴國輝，〈研究臺灣史經驗談〉，《夏潮論壇》，第 12 期（1984 年），頁 29-35；吳德山，〈走出「臺灣意識」的陰影——宋冬陽臺灣意識文學論底批判〉，《夏潮論壇》，第 12 期（1984 年），頁 36-57；秦琦，〈神話與歷史，現在與將來——評「夏潮論壇」對黨外的批判〉，收入施敏輝編，《臺灣意識論戰選集》（臺北：前衛，1988〔1984〕年），頁 173-184。

更形密切。

1980年代上半葉，黨外政論雜誌以大量的篇幅重新挖掘日本殖民統治史，特別是臺灣人的抗日運動。這些歷史討論強調，黨外的反國民黨運動是臺灣人長久以來反抗異族統治的傳統延續。<sup>25</sup> 這意味著國民黨政府和日本殖民統治一樣，都是「外來政權」。這些文章認為，雖然臺灣人的抗日鬥爭完全失敗，但是臺灣人在殖民統治期間已發展出對臺灣的特殊認同感，異於他們原先對中國大陸的認同。許多黨外雜誌作者認為，日本人帶來的現代政治統治與經濟發展，使漢人移民原先基於中國大陸原鄉（漳、泉、粵）情懷所產生的群體界線逐漸淡化，因此使眾多的地方社群融合成爲一個全島性的社會，而臺灣人的共同體感受也逐漸浮現。他們以讚賞的口吻談論日本人所推動的社會經濟現代化，強調臺灣意識對抗中國意識的正當性。對於提倡臺灣意識的黨外人士來說，日本的殖民統治事實上一項寶貴的歷史資源。<sup>26</sup> 當時受到政治劇變與黨外所影響的《笠》、《臺灣文藝》成員等文學界人士，其傾向也是如此。

黨外更批判整體的中國史觀，認爲中華人民共和國或國民黨宣稱「臺灣在歷史上是中國的一部份」，代表傳統的「帝王史觀」或「天朝史觀」，而這種史觀又來自「中國沙文主義」或「漢人中心主義」。<sup>27</sup> 爲了駁斥這種政治宣稱與史觀，黨外政論雜誌致力於探討原住民的古老歷史，並強調漢人移民征服、剝削原住民的經過，以表示他們認同於被壓迫的原住民，並且與做爲壓迫者的漢人劃清界線。在這種歷史敘事中，做爲外來政權的國民黨政府，正是當前中國沙文主義和漢族中心主義的主要推動者。

一些黨外雜誌作者更進一步挑戰所謂臺灣人（包括福佬人與客家人）

---

<sup>25</sup> 例如顏尹謨，〈日據時代與國民黨統治下反對運動模式〉，《政治家》，第16期（1984年），頁60-64；參照施敏輝，〈「臺灣意識論戰選集」序〉，收入施敏輝編，《臺灣意識論戰選集》（臺北：前衛，1988〔1985〕年），頁1-7。

<sup>26</sup> 例如施敏輝編的《臺灣意識論戰選集》（台北：前衛，1988年）中所收錄的陳樹鴻、高伊哥、林濁水、施敏輝的文章。

<sup>27</sup> 例如高伊哥，〈臺灣歷史意識問題〉，收入施敏輝編，《臺灣意識論戰選集》（臺北：前衛，1988〔1984〕年），頁167；施敏輝，〈「臺灣意識論戰選集」序〉，頁4。

是純種漢人的說法。他們指出「平埔族」被同化而融入早期漢人移民社會，特別是早期來自中國大陸的男性移民與平埔族女性通婚，使臺灣人的血緣混雜而異質。這些作者強調原住民扮演的角色，提倡以「本土化」的角度理解臺灣的過去，書寫「臺灣人觀點的臺灣史」。他們相信，闡述臺灣史時，唯一能夠擺脫中國沙文主義和漢人中心主義的正確參考架構，就是臺灣人民賴以立足的這塊土地。楊碧川以高伊哥為筆名，批判《夏潮論壇》的作者群。他在 1984 年發表的〈臺灣歷史意識問題〉一文，是這種本土化觀點的典型陳述。他強調：

對於現代的臺灣人而言，不論他是福佬人、客家人、高山族，以及大多數早被同化而僅少數還保持原貌的平埔族，數百年的種族鬭爭史不必迴避，也不必刻意分化，造成彼此的敵視。這三個種族數百年來都共同面臨一個接一個外來「頭家」的殘酷統治，而在共同的命運下，認同這塊土地上的社會＝經濟共同體，一起創造歷史、繁衍子孫。

這個雜揉著漢文化、日本文化及馬來文化的社經共同體，在外來帝國主義的侵略壓力下逐漸成長，並隨著統治力的轉換而變動。這就是臺灣歷史發展的客觀條件。認同這塊土地，以臺灣人自居，就是主觀的臺灣歷史意識。……

又為何必須在「臺灣人」之上，必然地有「中華意識」存在？那麼平埔族、高山族和漢人的混血後代又該認同誰呢？為什麼必須以這種「上位意識」強壓自己的同胞？<sup>28</sup>

楊碧川對外來頭家、誰是臺灣人、臺灣人命運共同體等的看法，彷彿呼應了七〇年代末呂秀蓮的論述。綜合來說，在八〇年代上半葉，黨外人士對臺灣的過去，發展了一套堅定而全面的闡述，用來對抗中國史觀的敘事。對他們而言，臺灣史就是一部殖民與反殖民、壓迫與抵抗的歷史，長久以來臺灣人民是殖民與壓迫下的受害者，而臺灣意識就是一種被壓迫與抵抗的意識，是鼓舞民眾反國民黨鬥爭的核心動力。這樣的歷史敘事，經

<sup>28</sup> 高伊哥，〈臺灣歷史意識問題〉，收入施敏輝編，《臺灣意識論戰選集》，頁 167-168。

常闡揚臺灣人的抗日運動與早期的原住民歷史。

美麗島事件發生後數年間，黨外人士重新塑造臺灣人受難與抵抗的集體記憶，這奠定了往後政治反對運動的基調。八〇年代上半葉，他們重寫臺灣史，對此後臺灣民族主義的迅速開展相當重要。對臺灣史觀的推進，支持黨外的本省籍文學界人士也扮演重要角色。如前所述，黨外人士的獨特史觀，影響了《笠》與《臺灣文藝》兩個刊物的作家，而美麗島事件後的那幾年，圍繞在《笠》與《臺灣文藝》的文學界人士也與黨外建立密切關係。就像黨外雜誌作者致力於將臺灣的歷史認識本土化一樣，《笠》與《臺灣文藝》的作家與文學評論家也追求臺灣文學的本土化。從 1983 年開始，李筱峰、李永熾、鄭欽仁、陳芳明、張炎憲、楊碧川等多位專業的或業餘的歷史學者，陸續加入《臺灣文藝》雜誌社，成為「本社同仁」或擔任編輯委員。同時也從 1983 年開始，大約到 1985 年初，這份文學雜誌幾乎每一期都出現「臺灣史料溫習」、「臺灣歷史人物」、「臺灣人物回顧」、「臺灣歷史叢談」等專欄，討論臺灣的歷史人物與事件，尤其是屬於日本殖民時期者。上述的歷史學家，特別是陳芳明與張炎憲，此後都成為臺灣史觀的主要提倡人物，陳芳明更是臺灣意識與臺灣文學本土化的熱情倡導者。

隨著八〇年代上半葉黨外人士積極提倡臺灣意識、臺灣民族主義快速發展，加上 1986 年之後政治明顯地自由化，而執政的國民黨也產生「臺灣化」的轉變，這些使得臺灣史的學術研究，以及學術界廣泛的臺灣研究，都蓬勃發展。人文學者與社會科學家對日本殖民時期與戰後臺灣的興趣快速增長，平埔族的歷史與文化也受到特別的關注，而愈來愈多的研究生也投身於臺灣史或臺灣研究。這些都反映了追求本土化的集體認同的普遍渴望。

八〇年代中期之後，臺灣史研究的方向深受支持臺灣獨立的歷史學家影響，那些與《臺灣文藝》作家群關係密切的歷史學家影響力尤其顯著。1983 年 9 月，鄭欽仁在《臺灣文藝》發表的〈臺灣史研究與歷史意識之檢討〉一文，是當時清楚解釋「臺灣史觀」的先驅。這篇文章代表臺灣史研究已準備邁開新的步伐，也見證了八〇年代上半葉黨外人士的倡導對歷史

研究者的深遠影響。鄭欽仁認為，臺灣史的研究不能受限於中國史的觀點，唯有以世界史的觀點才能看到臺灣在過去與未來所扮演的角色，摸索出臺灣自立生存之道，擺脫周圍強權的糾葛。他指出以政權統治而斷代分期的「政治史觀」是落伍的，臺灣史家必須思考歷史的主體性，以「我們·人民」為歷史主角，而歷史也是為「我們」而寫。鄭欽仁批評，在戰後臺灣，「中原文化本位主義」是錯誤的統治理念，既造成許多不幸事件，也使歷史教育無法培養國民合理的觀念；臺灣的歷史教育過度強調中央集權、中國統一而忽略地域性、造成政治不安。他認為，「漢族沙文主義」正基於中原文化本位主義與中央集權觀念。鄭欽仁進一步強調，歷史上中國大陸的「大陸型文化」是內向的，臺灣的「海洋型文化」是開放的，兩者有顯著差異。臺灣先天的海國條件下的國家體制應該是自由、開放與進取的，但現有的國家卻在精神上、意識上加以否定。他認為臺灣數十年來地方意識的高昂是自然的事情，「落葉歸根有利於目前政權的穩定」，「更無須惶惑」。八〇年代上半葉之後，支持臺灣獨立的歷史學者提倡的臺灣史觀，大致上沒有超越鄭欽仁上述文章的論點。「建立臺灣主體性歷史觀」或「重建臺灣歷史主體性」，成為他們經常宣揚的核心理念。1995年2月「臺灣歷史學會」成立，由李永熾擔任首任會長。

八〇年代中期之後，重構歷史、重塑臺灣人集體記憶的各種努力中，最令人矚目的莫過於挖掘 1947 年二二八事件的真相，以及探索平埔族原住民的歷史。首先，八〇年代中期之後政治反對運動人士與歷史學者挖掘二二八事件真相，延續了黨外在八〇年代前半葉的作為，亦即致力於將臺灣的過去闡述為殖民與反殖民、受難與抵抗的歷史。雖然黨外雜誌曾努力挖掘事件真相，但一直要到 1987 年 2 月「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成立之後才破除歷史禁忌，使這個事件成為公共議題。在曾任《臺灣文藝》社長的陳永興帶領下，這個組織集合了許多民主進步黨（1986 年 9 月 28 日成立）領導人物與支持者，包括《笠》、《臺灣文藝》、《文學界》、《臺灣新文化》、臺灣筆會等文學或文化團體，並且發動一連串群眾集會與街頭遊行，要求國民黨政府公布事件真相，替國民黨軍隊大屠殺下的受難者平反冤屈、恢復名譽。黨外人士在八〇年代上半葉所發展出來對臺灣史的全面闡述，被

用來解釋戰後國民黨統治下的臺灣，而追究二二八事件的真相，使得臺灣人「受難與抵抗」的象徵與論述更加發展。對黨外及其支持者而言，二二八事件無疑是台灣人的民族苦難或創傷。

再者，戰後人類學家對臺灣原住民的研究偏重山地原住民，八〇年代中期以前極少人重視平埔族歷史。一直要到八〇年代中期以後，平埔族歷史才引起廣泛注意。此後平埔族的歷史與文化，成為學院專業的與民間業餘的歷史學者、民俗學家、和人類學家等之間盛行的研究題材。這又影響了臺灣的族群意識，使愈來愈多的福佬人和客家人開始尋根，發現自己有著平埔族的血統，宣稱自己是平埔族。不少被認為屬於平埔族部落傳統的祭祀儀式和慶典活動開始出現，其中有重新舉辦的，許多也可能包括創新成分的。許多平埔族的領導人物，著手書寫自己部落的歷史。他們同時向政府要求，自己的族人應該與山地原住民擁有相同的權利，例如擁有特定的保留區。1991年7月，搶救平埔族凱達格蘭人「十三行文化遺址」的運動訴求，特別是「去中國化」、多元文化的傾向，以及「由下而上的歷史」的理念，正是臺灣史觀的特色，也具體呈現臺灣史觀漸增的影響力。隨著八〇年代末社會大眾普遍接受「四大族群」、命運共同體、族群平等與多元文化主義等理念，平埔族歷史的重新發現，既挑戰中國民族主義立場、質疑中國角度對臺灣史的詮釋，也促成新的臺灣人認同。愈來愈多人認為自己是平埔族，這種現象促進歷史意識的本土化，使人們將臺灣當做有別於中國的命運共同體。挖掘消失部落的歷史、認同它們，有利於人們將臺灣想像為一個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的國族，亦即「大家都是臺灣人」（九〇年代開始，國民黨與民進黨都經常運用這個口號），亦即雖然分屬不同族群，但都團結凝聚在一個臺灣的架構之下。

## 結論：從「去流亡」的鄉土史觀到「去殖民」的臺灣史觀

1979年底的美麗島事件，是七〇到八〇年代臺灣政治轉折劇變的關鍵

因素。1980 年代之後，在政治上，黨外與後來民進黨領導的政治反對運動積極宣揚臺灣意識，使臺灣民族主義運動顯著發展。七〇年代的回歸現實世代當中，以本省人年輕一代為主，提倡鄉土文學、挖掘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加上黨外人士對臺灣歷史的探索，這些都替後來的臺灣意識、臺灣民族主義準備了材料、奠下基礎。在這些基礎上，八〇年代臺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 快速發展，出現重塑臺灣文化、重寫臺灣歷史的各種努力，企圖「重構臺灣」，對臺灣社會影響重大。於是臺灣民族主義「去殖民」的「臺灣史觀」，逐漸取代七〇年代所興起「去流亡」而帶有中國民族主義的「鄉土史觀」。

1988 年，本省籍的李登輝繼承蔣經國，成為國民黨主席與總統。在國民黨的黨國決策階層中，本省籍的人數逐漸超過外省籍者。1991 年，原本於中國大陸選出的第一屆未定期改選之中央民意代表終止行使職權，國會全面改選。九〇年代初，國民黨內反李登輝的「非主流派」與親李的「主流派」鬥爭而失勢。國民黨內以外省籍年輕一代為主的「新國民黨連線」人士反對李登輝，懷疑他支持臺灣獨立。他們在 1993 年另組「新黨」，與民進黨及其他支持臺灣民族主義者發生激烈衝突。1996 年，臺灣舉行戰後首次的總統民選，國民黨候選人李登輝獲得過半票數而連任。在這種政治變化中，過去由國民黨威權統治所教化、基於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集體記憶、文化象徵等，繼續受到挑戰與批判。

## 徵引書目

### 一、專書

- 王育德，《臺灣：苦悶的歷史》。臺北：自立晚報，1964 年。  
 史明，《臺灣人四百年史》。聖荷西，美國加州：蓬島文化公司，1962 年。  
 呂秀蓮，《臺灣的過去與未來》。臺北：拓荒者，1979 年。  
 施敏輝編，《臺灣意識論戰選集》。臺北：前衛，1988 年。  
 施敏輝，〈「臺灣意識論戰選集」序〉，收入施敏輝編，《臺灣意識論戰選集》。臺北：前衛，1988〔1985〕年。



- 高伊哥，〈臺灣歷史意識問題〉，收入施敏輝編，《臺灣意識論戰選集》。臺北：前衛，1988〔1984〕年。
- 秦琦，〈神話與歷史，現在與將來——評「夏潮論壇」對黨外的批判〉，收入施敏輝編，《臺灣意識論戰選集》。臺北：前衛，1988（1984）年。
- 黃煌雄，《台胞抗日史話》。臺北：作者自印，1977年。
- 黃煌雄，《革命家——蔣渭水》。臺北：長橋，1978年。
- 黃煌雄，《國民黨往何處去？》。臺北：長橋，1978年。
- 黃煌雄，《臺灣的先知先覺者——蔣渭水先生》。臺北：作者自印，1976年。
- 黃煌雄編，《被壓迫者的怒吼——蔣渭水先生選集》。臺北：長橋，1978年。
- 蕭阿勤，《回歸現實：臺灣一九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0年第2版。
- 蕭阿勤，《重構臺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臺北：聯經，2012年。
- 蘇新，《憤怒的臺灣》。臺北：時報，1949年。
- Hsiau, A-chin. *Contemporary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 London: Routledge, 2000.
- Hsiau, A-chin. *Politics and Cultural Nativism in 1970s Taiwan: Youth, Narrative, Nation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1.

## 二、期刊論文

- 凡夫（葉榮鐘），〈革命家蔣渭水〉，《臺灣政論》，第5期（1975年）。
- 凡夫（葉榮鐘），〈臺灣民族詩人林幼春〉，《臺灣政論》，第3期（1975年）。
- 正宏，〈日本人眼中的臺灣抗日運動〉，《臺灣政論》，第4期（1975年）。
- 吳德山，〈走出「臺灣意識」的陰影——宋冬陽臺灣意識文學論底批判〉，《夏潮論壇》，第12期（1984年）。
- 林正杰，〈我的政治見解：黃煌雄訪問記〉，《這一代雜誌》，第15期（1978年）。
- 宋冬陽，〈現階段臺灣文學本土化的問題〉，《臺灣文藝》，第86期（1984年）。
- 張炎憲，〈臺灣史研究的新精神〉，《臺灣史料研究》，第1期（1993年）。
- 張景涵，〈我們的方向與現代化〉，《臺灣政論》，第4期（1975年）。
- 陳少廷，〈五四與臺灣新文學運動〉，《大學雜誌》，第53期（1972年）。
- 陳少廷，〈林獻堂先生與「祖國事件」——兼論臺灣智識分子抗日運動的歷史意義〉，《大學雜誌》，第43期（1971年）。
- 黃華，〈減刑人的信心〉，《臺灣政論》，第3期（1975年）。

- 黃煌雄，〈一項莊嚴的建議——紀念蔣渭水先生逝世四十七週年〉，《這一代雜誌》，第 12 期（1978 年）。
- 黃煌雄，〈從蔣渭水精神談起：兼論臺灣的昨天今天與明天——民國六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在「蔣渭水紀念歌發表會」上專題演講詞〉，《這一代雜誌》，第 16 期（1978 年）。
- 黃煌雄，〈競爭者之路——國民黨與黨外的健全化〉，《八十年代》，第 1 卷第 1 期（1979 年）。
- 葉榮鐘，〈臺灣民族運動的鋪路人蔡惠如〉，《臺灣政論》，第 1 期（1975 年）。
- 戴國輝，〈研究臺灣史經驗談〉，《夏潮論壇》，第 12 期（1984 年）。
- 顏尹謨，〈日據時代與國民黨統治下反對運動模式〉，《政治家》，第 16 期（1984 年）。